

【域外文化】

流亡的法兰克福学派与 批判理论的文化转向

——以《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1941)为考察中心

冯露 谢纳

【摘要】作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最为重要的学术阵地和思想文献,《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奠定了20世纪60-70年代的文化思想基调,较为全面地呈现出流亡时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面相,为后人研究批判理论的文化转向以及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不断探索,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本文以《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1941)英文版三卷本为学案文本对象,指认其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艺术批判的走向。从批判对象上看,呈现出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的互动融合趋向;从方法论上看,呈现出批判方法和实证方法的辩证融合趋向。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批判理论;文化转向

【作者简介】冯露,辽宁大学副教授、博士,东北大学人文艺术高等研究院外聘研究员(沈阳110036);谢纳,东北大学人文艺术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导(沈阳110819)。

【原文出处】《南京社会科学》,2021.2.134~140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资本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问题研究”(13&ZD071)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社会研究杂志》(1932-1941,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简称ZFS)创办于1932年,是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重要学术刊物。^①1939年,研究所大部分成员流亡美国后,该刊更名为《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8-9期(1939-1941,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1940年,因欧洲战事改用英文在美国出版;1942年,因经费等问题停刊,前后历时十年。^②该刊汇聚了霍克海默、阿多诺、波洛克、马尔库塞、洛文塔尔、弗洛姆和本雅明等第一代批判理论家,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最为重要的学术思想阵地。《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为我们研究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流亡美国时期的发展嬗变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文献,然而,国内外学界却对此关注不够,这不能不说是法兰克福学派学术史研究上的一个缺憾。在此,我们以1941年英文三卷本为学案文本对象,指认其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艺术批判的走向。从批判对象上

看,呈现出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的互动融合趋向;从方法论上看,呈现出批判方法和实证方法的辩证融合趋向。

一、流亡时期的《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

为躲避纳粹迫害,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于1934年移居纽约,开始了流亡生涯,研究所随之迁入哥伦比亚大学,成为其附属机构。随着研究所大部分成员陆续来到纽约,霍克海默、波洛克、马尔库塞、洛文塔尔、诺伊曼等都在此处工作,阿多诺、弗洛姆则主要在寓所工作,这里由最初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纽约分部逐渐变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流亡美国的研究中枢。^③1940年夏天,欧洲战事导致《社会研究杂志》无法在巴黎继续出版,因此该年度第三卷更名为《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并开始用英文出版。这标志着流亡知识分子从欧洲到美国的知识生产转移,同时也标志着批判理论开始从社会批判转向文化批判。

从1941年三卷本的内容来看,魏玛共和国(1918-1933)至两次世界大战期间(1918-1939)持续的政治动荡极大地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哲学的发展,纳粹主义的兴起对他们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1941年三卷本再一次出现极权主义批判主题,大篇幅介绍了权威主义人格研究的进展,极权主义产生的根源成为其最重要社会心理学议题。长期以来,学派成员一直试图将社会科学与弗洛伊德心理学相结合,而弗洛姆的研究对此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同时,在美国大众文化冲击下,此一时期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研究视角更多地转向了大众文化,他们特别关注好莱坞、迪士尼、流行音乐等大众文化现象。在1941年英文版中,阿多诺、霍克海默、基希海默、马尔库塞、波洛克、古兰德都发表了文章:霍克海默的《艺术与大众文化》《理性终结》;阿多诺的《论流行音乐》《今日斯宾格勒》《凡勃伦对文化的攻击》;马尔库塞的《现代技术的一些社会意义》;基希海默的《政治妥协结构的变化》《论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律秩序》;古兰德的《技术发展趋势和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结构》等。此外,还有一些学派以外的学者加盟,如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赫佐格等,这无疑有助于批判学派进入新的研究领域。1941年特别推出了“现代大众传播问题”专刊,组织刊发了《借来的经验:日间广播剧听众分析》《好莱坞与欧洲危机》《无线电作为减少个人不安全感感的工具》《无线电与教育》《行政与批判的传播研究》等对大众媒介社会功能进行批判反思的传播学文章。霍克海默认为,该专刊是“社会科学研究所与哥伦比亚大学无线电研究办公室之间合作的结果。在批判理论与实证研究之间的相互作用方面出现了许多具体问题,我们认为有可能给出了一种方法的示例,该方法特别意识到必须将理论思维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它使我们感到非常满意,我们的一些想法首次被专门用于美国题材并引入美国方法论的争论”。^④第二期专题是法西斯主义批判,刊发了《技术发展趋势和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结构》《国家资本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是新秩序吗?》等文章。霍克海默提出警示:“威权主义社会在欧洲自由主义崩溃之后形成,最典型的情况发生在德国。随着法西斯主义的

到来,自由主义时代典型的二元论,如个人与社会、私人与公共生活、法律与道德、经济与政治非但没有被超越,反而被遮蔽。个人相对于社会而言越来越不独立,而社会却落入了摆布。随着个人的衰落,反对威权的道德情感已经失去了力量,而威权则被赋予了一种扭曲的道德意识。”^⑤

三卷本文章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原创文章(original articles);一类是评论文章(reviews)。原创文章的作者主要是学派的核心人物,呈现出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艺术批判的走向。其中,关于文化工业的批判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本之一。霍克海默在《艺术与大众文化》一文中首次提出“文化工业”概念:“长期以来,文化被这些操纵的乐趣所取代,它已经具有逃避现实的特征。人们已经进入一个私人的概念世界,并在重新安排现实的同时重新安排了自己的思想。内心的生活和理想存有保守的因素。但是,由于他丧失了这种避难所的能力,这种能力在贫民窟和现代定居点中都没有兴旺发展,因此他丧失了构想与他所生活的世界不同的世界的的能力。另一个世界就是艺术。如今,它只能在那些毫不妥协地表达出摩纳哥人与乔伊斯的丑陋散文和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等绘画之间的鸿沟中生存下来。这样的作品所传达的悲伤和恐惧与那些出于理性原因而脱离现实或反对现实的人的感受并不相同。他们背后的意识是一种与社会隔绝的意识,被迫变成奇怪、不和谐的形式……让希特勒变得出色的这一代人对动画片强加于其无助的角色的抽搐感到了充分的愉悦,而不是毕加索的惊世骇俗,毕竟毕加索没有提供娱乐,也无论如何无法‘享受’。拉斐尔的蓝色地平线与迪士尼的风景区相距甚远……今天所谓的流行娱乐实际上是文化产业引发、操纵和暗示的需求恶化。这与艺术没什么关系,尤其是在伪装成艺术的方面。必须参照社会变化来理解大众,这不仅是数量上的而且是质的过程。它从来不是由群众直接决定的,而是始终由其他社会阶层的代表决定的……如今,所谓的娱乐已取代了艺术传统,大众性与艺术作品的具体内容或真实性无关。在民主国家,最终的决定不再取决于受过教育的人,而是娱乐行业。流行包括人们不受限制地适应娱乐业,认可

他们喜欢的东西。对于极权国家来说,最后的决定权在于严厉的和虚假的宣传的管理者,这本质上是对真理的漠不关心。”^⑥

通过文化工业批判,霍克海默看到资产阶级艺术中的意识形态,当他们代表一种自由之时,也即是一种流行的社会妥协。阿多诺同样对文化工业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论流行音乐》无疑是现代音乐社会学最重要的文献之一。阿多诺在讨论现代音乐性质时引入了商品拜物教的概念。阿多诺并非侧重于从心理学角度来考察听众的音乐意识嬗变,而是侧重于从社会学角度来考察音乐生产的社会境况,并在此背景下描述人们的审美主观行为。在阿多诺看来,在商品逻辑主导一切的社会里,艺术所表现的独特性实质上不过是一种伪个性化的东西,听众的音乐意识似乎是从艺术品本身中浮现出来的,生产者与全部作品的社会关系构成对象现有的社会关系。“发行者想要的音乐,既要从根本上同其他成功的表演相通,又要从根本上与之不同,相同可以被自动销售,不同才能被记住并获得成功。歌曲成功的标准化通过塑造听众的听力而控制了他们,因此具有伪个性化特征。美国的流行音乐背后的个性不过是每件消费品中的标准化。标准化必须被隐藏并与伪个性化关联。伪个性化是指在标准化基础上赋予文化大规模生产以自由选择或开放市场的光环。个人主义的残存以品味和自由选择的意识形态范畴与伪个性化一致,使听众忘记了他们所听的内容已经被听过了,或者被‘预先消化了’。”^⑦其实,阿多诺早在《关于音乐的社会状况》(1932)中就开始尝试将现代音乐问题分析引入到现代社会语境中进行,并希望社会精英分子用艺术逻辑来对抗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商品逻辑,提倡艺术成为“反映困苦密码来引发变革”。在《论爵士乐》(1936)中,阿多诺深入批判看似具有解放功能的爵士乐,指认它代表了流行音乐伪个性化、标准化、程序化等特征;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形式,流行音乐有助于使人沉沦于异化状况之中,变身为社会的黏合剂,它置换人的真实愿望和需要,代之以伪个性化的自由。这些音乐社会学分析构成了阿多诺音乐批判理论的总体风格,同时也凸显了社

会学美学研究在杂志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

关于评论文章,霍克海默认为:“由于出版一本与老杂志具有相同目标和程度的杂志既浪费时间又太过冒险,因此我们想到了一个完全限于文化批评的较小项目,即分析客观精神领域的作品:书、杂志、戏剧、电影、音乐作品等。这样的评论将很容易写,并且没有风险。”^⑧评论文章主要是书评,所评书籍多为1938-1941年间出版,有近半数评论是对主题相同或相近的多部书籍的集体评论。除了学派核心成员外,魏尔、科尔施、马辛、古兰德、古特曼、诺伊曼等学派成员均在杂志上撰写了评论文章。其中,古特曼评述《政治宣传》《美国战争宣传》《宣传的艺术》等新书,分析了有关纳粹德国的宣传策略及方法,认为极权主义的宣传方法发挥了情感而非理智的作用,包含着所有可能的虚假和情感吸引力。沙赫尔特重点推介了弗洛姆的《逃避自由》,认为弗洛姆在分析自由的心理学辩证法时,对现代人的社会和个人心理做出了最杰出和最具挑战性的研究。弗洛姆分析了现代人的自由含义以及摆脱消极自由的机制,为深入研究纳粹主义心理学提供了工具。这使弗洛姆扩大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威权主义的早期研究,并增加了新的见解。这些评论文章虽篇幅不大,但观点犀利、时效性和针对性强、问题意识突出,是了解流亡时期法兰克福学派十分难得的文献史料。

二、社会与文化、批判与实证的互动融合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最为重要的学术刊物,《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标示了批判理论从侧重社会批判转向侧重文化批判的过程,呈现出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相互融合的趋势。从批判对象上看,它标示了批判理论转向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的互动融合。从方法论上看,它标示了从批判方法转向批判方法和实证方法的辩证融合。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可以说是最具开放包容性的学派。这是因为,它并非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内部流派,从一开始它就对所有理论思想开放,如精神分析、道德哲学、语言学理论等等。它并不抵制所谓“资产阶级”思维模式的渗透,也从未假设单凭一种主义就能获得所有问题的答案。因此,能以一种创造性而非防

御性的方式来应对社会文化的挑战。

从批判对象上看,《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标示了批判理论转向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的互动融合。研究所早期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史学为主,但却无力回应发达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资本主义新出现的社会文化问题,更难以运用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问题。在研究所第一代领导人格吕堡(Carl Grünberg)之后^⑨,霍克海默将研究重点转向哲学与社会学、文化与意识形态研究,而不再过多地介入无产阶级工人的政治斗争实践。这实际上是将注意力集中在物质生产范围之外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即家庭、文化和意识形态。正是通过“权威与家庭研究”“广播音乐研究”和“权威人格研究”等一系列研究合作项目,一种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被编织到学派的研究之中,从中探寻不同学科、不同学派、不同思潮、不同视域的互动融合。

流亡美国后,学派成员亲见美国大众文化的兴盛发达,对于一贯坚守批判立场的法兰克福学派大多数成员来说,美国的大众文化乃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需要将其纳入批判理论的议事日程。正如阿多诺所言:“在美国,我不再天真地崇拜文化,而是获得外在地审视文化的能力。”^⑩这种“外在地审视文化的能力”可以理解作为一种从欧洲文化向美国大众文化研究视域的拓展,并且也被视为阿多诺从对精英文化价值思考转向大众文化经验解读的方法论尝试。与此同时,直面奥斯维辛之后的问题,促使批判理论深入探究纳粹主义的文化根源。对此,阿多诺在《没落的斯宾格勒》中对斯宾格勒的文化理论进行分析批判,其焦点在于如何直面大屠杀问题。基于斯宾格勒历史观所赖以建基的尼采式的虚无主义和歌德式的自然主义,阿多诺指认斯宾格勒的文化理论具有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特征,回应来自实证主义的文化挑战,并以其激进的批判精神反思了欧洲危机的时代问题。面对过去历史的残骸,批判的洞察力至关重要:压迫不仅仅源自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唯物主义根源,文化也参与其中,而且正是通过文化才使压迫得以最大程度

上的维持。因此,行动的重点必须来自文化批判。阿多诺提出,“我们应该意识到文化本身固有的野蛮因素,只有那些挑战文化观念的因素不亚于对野蛮现实的挑战,才有机会幸免于斯宾格勒的判决。当斯宾格勒用猎手的眼光窥视着人类的城市,仿佛他们就是真正的荒野。但有一件事他没有注意到:在衰败中变得自由的力量。它们的反对是我们唯一的希望”。^⑪

我们看到,霍克海默对文化和意识形态如何重现资本主义体系的关注涉及了批判理论从政治经济学向文化艺术批判的转向。这种转变的结果可以从这样的方式中看出:在美国流亡期间撰写的两部作品——霍克海默、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1944)和阿多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1951)。这两部作品在保留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同时,以“奥德赛隐喻”资产阶级形象,将批判理论的重心从资本主义批判转向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在后期阿多诺美学研究中,对现代艺术中表演艺术和行为艺术的区分与评判;对爵士乐为代表的流行音乐对大众欺骗的指认以及对迪士尼、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大众文化虚假性的批判,都无不受到文化转向的影响。可以认为,流亡生涯为批判学派在批判对象上转向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的互动融合提供了切实的生存背景,并且这一趋势影响到了后续的研究重点。

从方法论上看,《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标示了从批判方法转向批判方法和实证方法的辩证融合。1931年,霍克海默就任社会研究所所长时发表题为《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演讲,提出:“针对当前的哲学问题,工作组中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要团结起来,共同做一个人无法在实验室或其他领域可以独立完成的事情,即他们大规模地使用更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跟踪问题的过程并转换工作的对象,使其更加精确,同时又不失一般性”。^⑫这种跨学科研究的实现要依赖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互动与融合。这种方法论融合的尝试最初是在与拉扎斯菲尔德广播音乐研究中得以实质性展开。拉扎斯菲尔德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合作,可以追溯到1933年由霍克海默领导的《权威与

家庭研究》项目,拉扎斯菲尔德负责奥地利部分的资料收集,指导瑞士的调查工作,并与霍克海默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作为传播学实证研究的鼻祖,拉扎斯菲尔德创立的实证研究方法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法兰克福学派虽然一直对实证主义抱有强烈的抵制,但是在阿多诺与拉扎斯菲尔德关于广播音乐项目的合作中,批判学派逐步认识到实证方法在文化研究中使用的可能性。作为批判方法的补充,实证方法以大众传媒为中介,使阿多诺快速地进入媒介文化领域,拓展了阿多诺文化批判理论的研究视野。实证方法作为镶嵌在理论框架内的经验技术用来探讨社会文化现象,能否产生进步效应?这是阿多诺思考的关键所在。尽管理论不能被经验证实或证伪,但在被转化成研究问题时,理论观念可以经由经验得到有效丰富。可以推断,阿多诺在坚持批判立场的同时,也看到结合实证方法研究文化现象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方式。从最初的《权威与家庭研究》(1933)把批判理论运用到具体的、经验的、可证实的问题上的第一次尝试,经由广播音乐项目(1939)合作的磨合,《权威主义人格》(1945)作为“反犹太主义研究”项目成果之一被誉为“社会科学划时代的事件”,显示出定性批判方法与定量实证方法并非不可调和。1940年代末,社会研究所迁回德国时带回了在美国习得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1955年,以波洛克名义出版的“群体互动研究”作为研究所返德后第一个合作项目,其基本目的就是把美国实证研究方法介绍给德国公众。1965年研究所成立了经验研究分部,旨在传播在《偏见研究》系列丛书中日臻成熟的方法,帮助德国人直面他们迷恋于法西斯主义的更为深刻的根源。追本溯源,《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1941)独家刊载了有关“广播音乐研究”的诸多成果,并以大篇幅重点介绍《反犹太主义研究项目》的阶段成果,示范了实证与批判的方法论融合的积极性。

三、《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思想史意义

马丁·杰伊认为:“研究所创造力最伟大的时期是在美国流亡的时期。”^⑧英加·索尔蒂(Ingar Solty)也撰文指出:“批判理论的形成主要发生在流亡中。”^⑨

由此可见,流亡美国时期对于探究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思想史意义非同一般,而《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则为学术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最为珍贵的历史文献。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流亡美国对于美国的社会文化思想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或许可以说,正是由于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的学术活动,改写了美国哲学社会科学后来的发展走向。在此,我们主要强调两点:一是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传入美国,以德国式的激进左翼改变了美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二是将批判性思想方法推广到美国,以批判理论改变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倾向。

通过建立一种集体协作的跨学科研究方式,霍克海默保存并传递着法兰克福学派所独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研究所迁往美国之后,当时的美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持有警惕态度,霍克海默讲究策略,坚持不懈地保留并继续了批判理论传统。当阿多诺还未移居美国之前,他就写信提醒言论激进的阿多诺:“我请求你在到达美国之后在为社会研究所讲座的过程中,千万要避免谈论政治话题,你只要讲科学就可以。即使像社会主义这样字眼也要避免使用。不要因为你个人的言论而影响到研究所,让人们误以为这代表了研究所的公开立场。”^⑩这反映出霍克海默到美国后,既要适应新的环境,又要保持学派的批判传统的两难处境。流亡时期使用德语的社会科学研究在英美社会科学界很难占有一席之地,即使大多数文章是在纽约撰写或在研究所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之后完成,该杂志仍然坚持在巴黎出版发行。1939年战争爆发时,霍克海默出于担忧写信给法国出版商,后者告诉他教育部长让·吉拉杜(Jean Giraudoux)认为该杂志能继续在巴黎出版是一种荣幸。直到希特勒的军队占领了巴黎之后,该刊才在纽约以英文出版。甚至几十年后,霍克海默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指出,当时的《社会研究杂志》决定应该保留被国家社会主义摧毁的德国文化和语言的主张,令研究所的成员对此深信不疑,这种有意识地保持德语杂志的行为也使研究所的成员信服:“因为我们也有能力负担得起——有这笔钱真是福气——我们认为保存和发展我们在法兰克福开

始的工作是我们的职责。而且,从根本上讲,您只能通过培养德语并按照德语进行传统思考,从而做到这一领域的每个人获益。……我们经常受到美国人的谴责,或者被问到:您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不以英文出版该杂志等?我们是故意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真的认为我们正在执行独特的功能。”^⑥他们试图保持具有德国思辨传统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即使在新的环境下,也以努力促进整个社会的理论及其辅助科学为己任,将理论的“概念性思维”视为“改善现实的因素”,这成为流亡时代为数不多且逐渐消失的“以德语将德国人文传统延续到国外的科学机构”之一。作为流亡者的言说,杂志为人文主义的保存提供了鲜活的保障,挽救了濒临灭绝的德国文化传统,当然这也包括德语的作用。

批判理论的发展首先要与传统理论相区别,传统理论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西方形而上学;二是传统理论对科学实证主义的推崇。首先,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系统,设立了“绝对精神”“绝对理念”,静止地、片面地、孤立地看待问题,设置了某种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这些本质规律把事物固化,似乎内部存在着某种理论逻辑。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预设了永恒的、必然的铁的规律,但历史未必被预设的规律所操控,更未必就按照这个铁的规律运转,历史也会有偶然性和多样性。因此,预设了超强规律的传统理论具有形而上学特征。其次,传统理论对科学实证主义的推崇。实证主义以客观中立的立场来研究事物,这种客观立场要求保持研究的客观性。但霍克海默提出,这种客观取消了理想精神与价值判断。批判必须具有价值立场和目标,如果取消了主体的批判尺度而追求纯粹客观,难免陷入科学主义的窠臼。因此,霍克海默认为,传统理论反映了一种肯定性思维,是预先设定了存在于历史的规律与逻辑。打着科学的旗号,貌似客观的科学实证,却取消了价值判断,是一种肯定的思维,沦落为对现存制度的一种肯定。霍克海默坚持要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批判异化,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杂志上每篇文章都来自霍克海默的学术圈,这就使刊物呈现出批判理论的特征。所有这些作者的理论

努力在杂志中得以彰显,对于某些读者来说,它代表着智力和文化的储备;对于其他读者而言,它构成了一个信息的过滤器,甄选出当时具有价值潜力的作品。在这些评论中他们批评资本主义、现代技术、机械唯物主义和娱乐文化,认为它们代表了社会控制的新形式。这样的分析吸收了从康德到黑格尔,再从马克思到韦伯的传统元素,表现出敏锐的危机意识和清醒的远见。

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参战,晨边高地不再是一片静土。霍克海默在1940年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后,于1941年从纽约移居洛杉矶。随着研究所在纽约和南加州之间距离的加大,集体工作的时间与空间受到了削弱。迫于巨大的经费压力,该刊于1942年停刊。霍克海默将精力集中在与阿多诺合著《启蒙辩证法》(1947)^⑦;洛文塔尔与马辛合著了《破坏的彩排》;诺伊曼^⑧、马尔库塞、基希海默^⑨留在美国为中央情报局(CIA)的前身战略服务办公室(OSS)研究与分析处服务。尽管战后霍克海默、阿多诺和波洛克回到法兰克福重建研究所,但几经努力却复刊未果。霍克海默曾说:“批判的时代需要批判的哲学”^⑩,晨边高地十年,正是批判理论成熟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极具创造力的时代。《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是当时社会科学领域唯一存留的独立期刊,它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时代语境中,成为流亡时代知识精英的理论漂泊与精神记忆。

注释:

①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60305205135/http://www.ub.uni-frankfurt.de/archiv.html>, 美国河畔法兰克福大学档案馆。

② Matzner, N., & Schmidt, L.-M. (2014). Tagungsbericht: Das Projekt “Zeitschrift für Diskursforschung” und die Perspektiven disziplinärer, inter- und transdisziplinärer Kooperation. <https://doi-org.proxy.mul.missouri.edu/10.17169/fqs-15.3.2219>.

③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Ten Years on Morningside Heights: A Report on the Institute's History(1934-1944), 1944, S. 3

④⑤ Max Horkheimer, Preface,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Volume IX Issue 2,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Morningside Heights New York City, 1941, p. 195, p. 198.

⑥ Max Horkheimer, Art and Mass Culture,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Volume IX Issue 2,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Morningside Heights New York City, 1941, pp. 294-296.

⑦ T. W. Adorno (with the assistance of George Simpson), On Popular Music,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Volume IX Issue 1/1941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Morningside Heights New York City 1941, pp. 23-25.

⑧ Brief von Horkheimer an Löwenthal vom 3. Oktober 1947, in: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7, a. a. O., S. 907 转引自 Gregor-Sönke Schneider, Keine Kritische Theorie ohne Leo Löwenthal. Die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1932- 1941/ 42), 2012, Von der Philosophischen Fakultät der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Universität Hannover zur Erlangung des Grades eines Doktors der Philosophie, S. 272.

⑨ 卡尔·格伦伯格: (Carl Grünberg, 1861-1940) 德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

⑩【德】格尔哈特·施威蓬豪依塞尔:《阿多诺》, 鲁路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第7页。

⑪ T. W. Adorno, Spengler nach dem Untergang, Prismen: Kulturkritik und Gesellschaft, Suhrkamp Verlag, 1955, S. 81.

⑫ Max Horkheimer, Preface,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Jahrgang 1,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32, p. 25.

⑬【美】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1923-1950)》, 单世联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326页。

⑭ Ingar Solty, Max Horkheimer, a Teacher Without a Class, <https://www.jacobinmag.com/2020/02/max-horkheimer-frankfurt-school-adorno-working-class-marxism>, 2020-02-15.

⑮【德】H. 贡尼、R. 林古特:《霍克海默传》, 任立译, 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第44页。

⑯ Löwenthal, in: Löwenthal/Greiffath “Wir haben nie im Leben diesen Ruhm erwartet”, Gespräch mit Leo Löwenthal, a. a. O., S. 213/214 转引自 Gregor-Sönke Schneider, Keine Kritische Theorie ohne Leo Löwenthal. Die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1932- 1941/42), 2012, Von der Philosophischen Fakultät der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Universität Hannover zur Erlangung des Grades eines Doktors der Philosophie, S. 51.

⑰《斯坦福大学哲学百科全书》霍克海默词条,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EP),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horkheimer/>.

⑱ 弗朗兹·利奥波德·诺伊曼: (Franz Leopold Neumann, 1900-1954), 德国政治活动家,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⑲ 基希海默: (Otto Kirchheimer, 1905-1965), 德国法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⑳【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 李小兵等译, 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第176页。

Frankfurt School in Exile and Cultural Turn of Critical Theory: An Inspection Centered on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1941)

Feng Lu Xie Na

Abstract: As the most important academic position and ideological literature of the Frankfurt Social Research Institute,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laid the tone of cultural thought from the 1960s to the 1970s. It provides an important literature basis for the cultural turn of research critical theory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three-volume English edition of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1941) as the textual object of the study case, and identifies the trend from the criticism of political economy to the criticism of culture and 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bject of criticism, it shows the tendency of interactive fusion of social criticism and cultural critic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hodology, it shows the tendency of dialectical fusion of critical methods and empirical methods.

Key words: Frankfurt school;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critical theory; cultural turn